

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并同外国传教士理雅各、慕维廉、米士威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来,他因前往天京受阻,被迫滞留沪上多年。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艾约瑟、傅兰雅、花之安、罗孝全、裨治文等传教士,从而使他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他是从旧的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旧学根底较深,所以,通过中西对比,形成了上述他的那些改革社会的思想和主张。

《资政新篇》不仅是挽救太平天国政权的方案,而且也是改造当时中国的方案。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洪仁玕提出要“度势行法”,把学习西方同改造中国社会结合起来,把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推到新的高度。但需要指出的,《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起义没有任何渊源,它不是农民起义的产物,同当时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连不起来,因此,它在太平天国内部并未引起什么积极反响。

与洪仁玕几乎同时,另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容闳也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容闳,字纯甫,家住距澳门四英里的南屏镇。1836年入澳门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Mrs. Gutzldff)女塾寄读。1847年经美国教师布朗(Reris. R Brown)帮助前往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1850年考进耶鲁大学,毕业时获得文学士学位。由于容闳在美国生活了8年,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较直接的了解,1854年回国后,怀着“当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愿望,向中国社会介绍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并同上海地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进步人士如王韬、徐润、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建立了联系,同他们交换了自己改革社会的思想主张,并到处寻找政治力量,力图去实现它。

1860年,容闳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访问了当时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他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政建议,希望太平天国施行。其中有关社会政治制度及与此有关的内容有三条:(1)组织一个文官政府,代替军人执政,聘用有才干和有经验的人出任各行政部门的领导。(2)按科学原则建立新式军队,设立陆海军军事学校,培养训练有能力的军官。(3)实施民众教育、实业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①

^① 转引自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容闳还表示,如果太平天国政权愿意实施他的全部改革建议,并且提供经费的话,他将乐意效劳。但由于太平天国起义这时已进入低潮,始终处于同清军进行作战的紧张状态,无法实施他的建议。容闳在天京前后逗留了一个多月,认定太平天国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最后他离开天京,重新回到上海。1861年经李善兰等人介绍,他投入曾国藩幕下,来到了安庆。其时曾氏正在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外国船械。容闳幻想通过洋务派,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他协助曾国藩、丁日昌一手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后又担任驻美副公使。在李鸿章支持下,率派幼童赴美学习美国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知识。多次建议修铁路、办银行,戊戌维新中,积极投入变法。晚年更是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他探索奋斗了一生。

(三) 冯桂芬、郑观应、王韬力倡 学习西方议会民主政治

近代中国人开始认识中国同西方政治制度的异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一些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通过对东西方的比较,敏锐地觉察中西的异同。他们开始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到时代的呼吸和脚步声,从而把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的课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进士出身,是林则徐的门生。苏常失陷后,他流寓沪上,曾参与设立会防局和创办广方言馆,博求西学,以济世变。广泛披阅“夷场”(租界)书报和制造局所译西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冯桂芬出版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该书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抨击,提出在中国实现君宪政治的要求。冯桂芬对美国政治制度极为赞赏:“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匭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駸駸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敌无人哉?”^①冯桂芬还对中西社会进行了对比:“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②他从“君民”

① 转引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